

嵇文甫文集
上

河南人民出版社

45

责任编辑 王恩荣

嵇文甫文集(上)

嵇文甫 著

郑州大学嵇文甫文集编辑组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院长开封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19.625印张 433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600册

统一书号 11105·96 定价 4.75元(精)
3.55元(平)



作 者 （摄于一九五六年）

一九四八年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政治思想簡史

緒論——張其成著

開宗明義——講史稿序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啟序

（直截了當的說）

第二章客觀的時代——主要從歷史觀之演變及演變重

事實近代治法為法的進史，其在史經史觀的變遷

觀史與論史而有些人偏好用現史與耳的辨法，在史推

演，把史變為作事實，想這好，把史有也，新把史變

重往史上一說，一重則引三十三史之史，想以史說史，以史說

把史史變為史，一重則引三十三史之史，想以史說史，以史說

天龍孔隆，而史，即新史子建，是有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故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土地制度史，從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恒囑，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辯證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一他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在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何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前 言

一

“流光易逝如翻水”，我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和史学家嵇文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有一年了。在这风风雨雨、沧桑变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一直怀念着这位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嵇文甫同志学名明，字文甫，以字行，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诞生在河南省汲县一个市民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嵇占元，深受目不识丁之苦，尽管多方拼凑、节衣缩食，仍勉力供养儿子上学。嵇文甫先读了几年私塾，随后进入学堂。他天资聪明，学习努力，不论是盛夏酷暑或数九寒冬，都手不释卷，刻苦研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四年制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相当于附属高中），负笈古都，过着更加艰苦的日子，搭不起校内的食堂，就跑到沙滩的小铺里吃便宜饭，即是这样，也还是难以维持，经常饿着肚子听课，终于不得不含愤辍学，回到家乡作一名小学教员。他积累了两年的微薄收入，便又去北京，一举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后改为系）。这时的文科学长是陈独秀，同班同学有冯友兰、陈钟凡、孙本文等。三年的大学生活，使

他学到了知识，打下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功，同时也受到民主主义新文化潮流的陶冶。

一九一八年，嵇文甫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开封，任河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同时在开封一中、二中、女师及政法专门学校等校兼课。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五四”运动，震撼了全国，也震动了开封。青年学生纷纷集会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嵇文甫毅然站在学生一边，参加集会游行，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他站在新文化思潮的前列，大力提倡白话文，并向学生介绍《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把在这些刊物上刊登的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和鲁迅的小说以及俞平伯等人的新诗拿到课堂上给学生宣讲，从而把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革命的精神带到课堂上来，使学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感染，思想大为活跃。更为有趣的是，当时开封一师三年级学生徐玉诺、苏金伞等富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发表了一些新诗，受到守旧派的嘲讽和压抑。嵇文甫力反旧俗，把学生的作品作为教材在课堂宣讲，这在当时是颇有民主精神的，一时传为佳话。加之他对学生态度和蔼可亲，讲课生动活泼，很快成为一名有威望的青年教师。

对于河南社会及教育界的“面貌使更、精神不改”陈陈相因的状况，嵇文甫极为不满，决心要打破这一沉闷的局面。他回到开封不久，便和冯友兰、韩席卿等成立了《心声》杂志社，出版《心声》杂志，以新思想唤醒人心。这一《心声》杂志是“五四”前夕在河南发行的唯一的新型刊物，它以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大路而促进其进步”为宗旨。这一刊物从一九一八年秋开始发行，到一九二〇年一月共出版十期，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一些社会主义

思想，抨击了当时社会及教育界的弊端，对几千年来一直禁锢人们的封建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尽管《心声》的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的平等和自由，但它在当时的河南所起到的宣传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五四”高潮中河南的各种新刊物“不择而生”，是和《心声》启开先河的作用分不开的。

对嵇文甫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这个伟大的变革时期。由于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我国南方的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河南的形势也急剧地发生着变化。一九二五年春，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建立，王若飞、肖楚女等同志先后在此工作，区委机关的刊物《中州评论》公开发行，我党的影响在群众中日益扩大。“五卅”惨案发生后，全省各地群情激奋，迅速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有大批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开封一师是我党开展活动较早的地方。该校英文教员冯品毅曾任中共豫陕区委宣传委员，学生刘英曾代理过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当时一师的政治空气很浓，校园里墙报林立，对各种政治问题争相辩论。这期间，嵇文甫曾为以党团员为骨干的进步组织“光明少年团”撰写团歌歌词，并撰文支持开封教会学校学生反对宗教迫害的正义斗争，在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在此大好形势下，一九二六年冬，嵇文甫经学生刘英（明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受组织的委派赴苏联留学。

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担任“中国问题”课课代表，还兼任中大学生向国内报道消息的刊物《中国通讯社》的总编辑。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他曾亲身聆听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即《对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与启迪。正当他刻苦学习马克思

主义,研究苏联和中国的革命问题的时候,不幸得了肺病,虽辗转克里米亚医治,仍不见效,终于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经党组织同意回国。他回国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告失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的入党介绍人刘英已死),他和党失掉了联系,从此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他一直生活在国民党黑暗的统治之下,但他并没有颓废徘徊,而是坚持进步,坚持正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教学和学术活动,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嵇文甫在开封作了短期的停留和治疗后,年底即复去北平。先闲居一个时期,后应邀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在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等校兼课。在北大,嵇文甫主要讲授《先秦诸子思想》、《宋代哲学》、《清代学术思想》等课程。在课堂上,他曾和一位著名的唯心论教授唱“对台戏”,听他课的学生非常踊跃,都反映他讲得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令人叹服。“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抗日声浪日趋高涨,北大学生请他任《北大学生》的顾问,还经常应邀做报告。嵇文甫的抗日爱国的鲜明态度深受青年们的敬佩,因而也受到某些旧学者的忌恨;反共媚外的反动势力,也采取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打击迫害,使他在北大的处境日渐困难。这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公开把攻击的主要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他准备采取取消北大哲学系的手法,将顺从他的教师改教历史,对不顺从者将迫其改行,直至“不给饭吃”。嵇文甫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情很高,当然为胡适所不容。加之这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宪兵第三团在北平横行,迫害进步师生,侯外庐等同志被捕后,嵇文甫的行动已引起蒋特的注意。不久和他同在北大任教的范文澜也因宣传抗日,被关进“铁窗”。在此险恶的环境下,他不得不被

迫离开北平。

嵇文甫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回到开封，任河南大学教授兼文史系主任。当时，国民党嫡系刘峙任河南省主席，河南政界一派乌烟瘴气，在学校里由于CC和复兴社特务组织的横行，也是一片黑暗，广大师生对此深恶痛绝，嵇文甫和他们一起，不顾反动派的迫害与监视，积极投入了反蒋抗日斗争。

一九三五年底，在北平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震撼全国，开封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如地下的熔岩冲腾而起，组织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斗争。十二月二十一日，万余学生齐集龙亭后边体育场开会，并请嵇文甫讲话，嵇文甫欣然答应。那时，还没有扩音器，他对着喇叭筒宣讲，万余学生在寒风中肃立静听。会后，学生们的斗志更加高昂，高呼“反对华北自治”、“奋发图强，团结御侮”等口号，游行队伍向市内进发，直至发展到占领火车站，使陇海铁路中断一周。这就是著名的开封学生“卧轨”爱国行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在我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嵇文甫几乎将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出席各种救亡会议，组织救亡团体，出版刊物等。同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共河南省委直接领导下，他和姚雪垠、王阑西等一起主编了抗敌救亡刊物《风雨》周刊，当时省委的领导人朱理治、刘子久等同志常在《风雨》上发表文章。《风雨》发行近三十期，对推动河南的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同一时间，他又和林孟平等一起主编《大时代》旬刊。一九三八年春，他和范文澜等开办了“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请冯纪新同志（曾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为大队长，由中共在河南的公开代表马致远（即刘子

厚）教游击战术。年底，又将该训练班改名为“河南省抗战教育工作团”。嵇文甫出任团长，范文澜任副团长。他们经常深入群众，甚至步行到朱仙镇、尉氏、鄢陵、舞阳、许昌等地宣传抗日。工作团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仇视。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居然强令嵇、范离开该团。这时，他们被迫仍去已迁到鸡公山的河南大学文学院教书。一九三八年七月，河南大学校部和文理两院又北迁镇平，和原迁镇平的农、医两院合在一起。嵇老又兼任了文学院院长。一九三九年麦收后，河南大学全部由镇平迁到嵩县，文学院设在嵩县城西一百里的小山镇潭头。嵇文甫于一九四〇年夏也到了潭头。他除仍讲《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两门课程外，还开了《群经诸子选读》、《秦汉史》、《中国教育史》等课程。在他所讲的各门课程中，都贯串着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这对于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发展学校中的进步力量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课之外，他还经常应学生之邀，利用假日，和进步教师王毅斋、关梦觉等给学生作专题讲演。如嵇文甫作了《学术中国化问题》、《民族形式问题》、《大学生是否应参加政治运动问题》等专题报告。他的报告使青年们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认清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因此，他在师生中的威信很高，把它作为精神支柱；而国民党顽固派却对他极为恐惧和仇恨。一九四一年十月，在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嵇文甫同志被逮捕。在狱中的五个月，嵇文甫同志受尽了严峻的考验，对于他经常接触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未吐露一人，保护了党组织和革命同志。在狱中，他写了许多诗词，诗中写道：“寝贖六经三史，瓣香一峰二山”。“一峰二山”指的是三位抗清学者，借以表达他的抗日决心，矢志不变。嵇文甫同志被捕，引起了河大师生对反动派的极大愤恨，无不义愤填膺，怒

火满腔，学生以罢上军事课表示抗议，并立即发起了营救运动。他们分别向中苏文化协会和冯玉祥将军以及豫籍著名学者曹靖华、徐旭生、冯友兰等先生发出函电，争取各方面的援助。国民党反动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嵇文甫的声望，终于一九四二年三月释放了嵇文甫。消息传来，一些教师和学生，手擎火炬，戴月山行数十里，燃放鞭炮，夹道迎接日夜悬念蒙难归来的挚友和恩师！一九四五年春，在日本侵略军的枪声里，嵇文甫随着河南大学逃亡到陕西宝鸡。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初，随河南大学回到开封。一九四七年三月，为了向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河南大学教师联谊会决定全体教师一致罢教。接着学生罢课声援教师。五月十八日，蒋介石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一切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以恫吓爱国群众。五月二十二日上午，河南大学的六个学院和先修班、附属护校、附属产校的同学列队欢送赴京请愿代表团，并游行示威。五月二十八日，嵇文甫在河南大学小礼堂向学生作了《真理的具体性》的报告，鼓励学生的正义斗争。六月二日，以河南大学进步学生为首，掀起了全市性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游行，即所谓“六·二”学潮。嵇文甫同志的革命言行，为国民党切齿痛恨。他被河南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中。这时的嵇文甫同志虽明知自己身处险境，仍无私无畏地进行革命宣传，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河南进步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开封第一次解放，嵇文甫毫不犹豫地带领全家和进步教师、学生，如王毅斋、赵俪生、罗绳武、苏金伞等七十余入，同因战略需要暂时撤出开封的解放军进入豫西解放区，途次襄县城，受到刘伯承、陈毅、陈赓诸将军的热情接见。到了宝丰，又蒙邓小平同志设宴洗尘。在这个自由的新天地里，

嵇文甫异常兴奋，如鱼得水，他一边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积极筹备中原大学。一九四九年春，他和中原大学一起回到开封。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恢复河南大学，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兼校长，嵇文甫同志为副校长。一九五〇年十月，吴芝圃主席辞去兼校长职务，政务院即任命嵇文甫为河南大学校长。一九五三年八月，河南大学和平原师范学院合并，改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嵇文甫任院长。一九五六年，郑州大学成立，嵇文甫出任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嵇文甫同志除从事经常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外，还担负着繁重的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他先后担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等多种职务。他对于党赋予的每一项重托都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所以他总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出色地完成任务。为此，他虽然身患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却常常牺牲度假休养的机会，甚至一些节假日也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他一直战斗在繁忙的工作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正是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在省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因精神集中，思考过度，突患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的。

在旧中国黑暗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里，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日子里，尽管嵇文甫同志屡次受到政治上的迫害，精神上的折磨，但他始终站在革命的一边。这个坚持进步的“大把柄”，他一刻也没放弃过。解放以后，他虽肩负重任，却一直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和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由于他一贯坚持进步，忠诚党和人民的事业并做出了显著成绩，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象一条

涓涓的溪流，经过千回百转，终于流入了滔滔的大海，投向党的怀抱。嵇文甫同志一生的言行说明，他无愧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的一个好儿子。

嵇文甫在生活作风上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朴实无华、实实在在，这就是他经常所说的“庸言庸行”。他博览群书，精通诸家，融合古今，贯通中西，但他从没有任何优越感，不摆架子。他对待学生和青年教师，如同家人，平易亲切。特别是请教他学术问题时，他总是诲人不倦，教书育人，所谓“吐嘉言如锯木屑，罪罪不绝。”（赵倬生《忆述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在生活践履方面，他以“一峰二山”为师表。孙夏峰的“刻厉、庸行、实用”，王船山的“贞晦、博学、皎志”，全谢山的“渊博无涯，于书无不贯串”，都是他师法的榜样。他治学态度严谨，恂恂无华，力戒夸夸其谈，空而不实。他写文章，最恶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绝不东抄西录，硬充篇幅；如果几百字能够把话说完时，就不拉长到上千字。但即便是再短的杂文简论，总也要有自己的见解，给人以一定的启示。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沈致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上发表了《漫谈学术中国化》一文，而他的著作恰恰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化的文风。当有学生关心地问他为什么不尽量多写些文章，出几本大部头著作时，他回答说：要写就必须有啥写，写出来总得对人们起到有益的作用，不能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在《民族哲学杂话》的《楔子》中所说：他之所以要写这样的一本书，是“自抒心得，剪除浮辞”，“取材多方，不至枯燥”。其实，何止写这本书的态度是这样，他写一切著作的态度也莫不是这样。

他一生研究哲学和历史，都是本着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目的。这就是他从“一峰二山”那里批判地接受过来的经

世致用的精神。他在宋明理学家朱和陆王对立的两派中之所以倾向陆王,绝不是特别欣赏、有意发展陆王学派的唯心论,而是重视陆王学派所持有的某些求实和敢为精神,某些不为旧传统所束缚的创新精神。关于这一点,从他一九四〇年作的《陆象山的“实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赞赏陆象山(九渊)所说的:

“吾平生学问无他,只是一实”一语。他在该文中归纳出了陆象山自称为“朴实”之学的特点是:反空论,反矫饰,反格套和切要处用力,是“以简御繁,以一御万”和“只下要着,而不下闲着”。这些也正是嵇文甫本人做学问的特点。他喜欢简易直截,而不欣赏烦琐考证。他在讲到陆九渊和朱熹的鹅湖之辩中的唱和诗时,就兴趣盎然地反复吟诵了陆九渊的“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二句,流露出了他的思想感情倾向。他引用古人文章,都是紧紧围绕着特定的主题,不论引多引少,都是为了完满深刻地说明特定的主题。虽然有时还引得相当多,但他主观上并不是以多引为善。他更不是为了炫耀博学而故意扩大文章篇幅。他最讨厌以马列主义辞句和深奥古代文章来卖弄自己,恫吓读者!对于没有考虑成熟的意见,他更不随便发表。他的忠厚、朴实、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在生活上或做学问上,都是贯彻始终的。

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嵇文甫一向关心青年,热爱学生。有不少青年在他引导和支持下,走向革命岗位,在学术上受他启迪熏陶,成才者更是不乏其人。

河南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任访秋教授曾回忆说,一九四〇年他在河大讲授《现代文学》课程,并着手对晚明文学和袁中郎等作家进行研究,碰到很大困难,多得于嵇文甫先生的热情指导,终于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子产》两书。任访秋在学术上

的成长和进步，是和嵇文甫的热情帮助、鼓励分不开的。他曾深情地把嵇文甫称为自己终生学习的“楷模”。

一九四六年，不足卅岁的赵俪生（现任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自陕西来到河大，嵇文甫和他过去并不相识，但却把自己教了多年的“明清思想史”转给他教。这种风格在旧社会是不多见的。后来，赵又跟着他学习“宋代哲学”。“一年前我是泡在漫到脚脖的水里的话，那么，一年后，我已经泡到齐腰深的水里了”（赵俪生：《为学途上的一些遭际》）。赵俪生学问的进步，凝聚着嵇文甫的许多心血。

解放后，嵇文甫肩负着重任，工作十分繁忙，还经常深入学生中，从学习、思想、生活上给予关怀鼓励。一九五一年，他任河南大学校长时，一位青年学生写了一篇关于历史问题的小文章，送校刊转嵇文甫审阅。不久，嵇文甫看后亲自找到这个学生交谈，肯定了这篇文章的优点，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耐心地指导他修改，还对他说：“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商量。”作为一校之长的嵇文甫，对一个普通学生如此关心，是很令人感动的。

嵇文甫是一位有名的教授，在大学的讲台上，先后开了哲学、历史、思想史、经济史、教育史及马列经典著作选读等十多门课程。他学识渊博，讲解深刻，很受青年学生欢迎。他讲课的主要特色和他做学问及日常生活的作风一样是朴实无华，实实在在。他讲课不用讲稿，如同谈家常，说故事，娓娓而谈。他常对人说，尽管准备的内容很充分，倘若照稿一念，就显得干燥无味了，若是改用自己的话来讲，那就使人听了亲切而又印象深刻。他讲课的内容大都是自己的研究心得，他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真正作到了“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平易中求精深，在精深中出风趣。课堂气氛极为活跃。如他在讲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时，讲

到东汉神医张仲景的《伤寒论》时，他说：这确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但书里面也参杂一些五行阴阳的迷信色彩。如果有人说张仲景咋不根据解剖学来写呢？这就太难为他了。因为东汉时代，阴阳五行说是一种最高的理论，张仲景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个窠臼。你拿现代的“解剖学”和他作对比，就象你斥责黄巢、李自成“咋不接受无产阶级领导”一样荒谬。这就等于非历史主义向历史主义挑战，令人啼笑皆非。通过这样浅显明白的道理，使青年们在笑声中深刻理解了历史唯物论的道理。所以，嵇文甫的讲课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他的诲人不倦、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亦深得师生们的仰慕。

二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河南的学术界就有“南冯北嵇”的说法。“南冯”指冯友兰，“北嵇”就是指嵇文甫。他们两人同步、同乡，同在北大一个班里读书，都对哲学史“饶有兴趣”，而且差不多在三十年代前后，都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学术成就。冯是豫南唐河人，嵇是豫北汲县人，被人称为“南冯北嵇”，表明当时他们已成为河南学术界的两颗“明星”。

嵇文甫是一个笃实的学者，自一九一八年发表《老子发凡》起，几十年来，锲而不舍，著述哲学思想、历史评论、政治理论、杂话等著作三百余篇（本），约二百余万言。他对先秦诸子哲学、宋明理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研究有较高的造诣，他也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之一。他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嵇文甫同志研究中国历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

指导的。他不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战斗的唯物主义战士。在理论原则上，他是毫不含糊的。例如，一九二三年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过“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其中玄学派代表梁启超（这时他已堕落成为封建主义的鼓吹者）主张无批判地颂扬东方文化。他认为科学已成为西方的祸害。他在一篇《为学与做人》的文章中，主张用我国古老的文化形态——“仁”去超渡西方的“受害者”。为此，嵇文甫在《心声》杂志上写了《做人问题》一文，给以相当尖锐的抨击。文章说，梁任公的做人之道和我们的主张相距千里。因为“人不是悬空的、抽象的、漫无着落的東西，他与他的社会、国家、周围的一切情况，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不能“除去一切社会关系”离开当前应做的事，去故纸堆里找做人的标准。接着他指出，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中华民众的血快被帝国主义恶魔吸尽了，人民救死之无暇，还有什么功夫来高谈“道德仁义”？果真要做人，那就要首先针对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等等”，都加以痛快的解决，然后才能来讨论如何做人，把人看成一个社会的人，他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社会关系，受着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制约。上述言论充分说明，嵇文甫坚持运用历史唯物论来观察研究社会问题的思想是十分鲜明的，也是极其坚定的。

嵇文甫同志研究历史，首先注意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级的变化，用以说明各个阶级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面貌。嵇文甫在1961年出版的《春秋战国思想史话》的第一章《春秋战国——一个百家争鸣的伟大历史变革时代》中，开宗明义就这样说：“我们应该知道，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都是那一个时代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都有它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本章中讲到了农村公社的瓦解和工商业的兴起、以及阶